

全球思想史笔谈

[编者按]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是近年来欧美学术界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它由思想史研究发展而来,是对当前史学研究中全球转向的回应。全球思想史要求消除以往思想史研究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同时也希望打破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不平等的思想和知识等级体制。全球思想史强调思想在全球空间传播时与不同的地方经验所发生的交融、碰撞、混杂等复杂现象,同时也关注从之前被认为是边缘和底层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思想传播的可能性。为了使国内史学界关注这一研究领域,本刊特邀国内外几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全球思想史的理论、方法及实践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对该问题的讨论中来。

思想史的国际转向

大卫·阿米蒂奇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历史学家在其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投身于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研究。与其他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一样,他们假设在政治上组成国家的拥有自我认同的民族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对象。^① 据此,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叙述民族国家如何形成、发展以及如何与其他民族国家发生相互作用。即便那些在著作中有意跨越民族史边界的历史学家也在沿着相似的研究路线工作。比如,研究外交史的史学家利用民族档案来重建国家间的关系。研究移民史的史学家追踪新的民族是如何形成并融入当前国家的。^② 研究帝国史的史学家研究作为民族扩张结果的帝国,尽管他们一般在宗主国(大多数在欧洲)的历史与宗主国殖民地(大多数在欧洲之外)的历史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

在所有这些领域,历史学所讨论的问题都涉及稳定性而非流动性、涉及固定不变的事物而非混杂交错的事物。近年来,各领域的历史学家都在转向他们分别称之为国际的、跨民族的、比较的和全球的研究。他们研究的范围、主题或动机不尽相同,也未在这些非民族的历史研究路径应如何彼此区分上达成共识。研究国际史的史学家通常认为存在一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社会,但为了描绘国家间的关系,他们的视野超出了国家边界,从外交、贸易到移民和文化交流,不一而足。研究跨民族史的史学家考察越出领土边界的各种进程、运动和制度,比如,环境问题、有组织犯罪、流行病、跨国公司、宗教和国际社会运动。研究比较史的史学家论及彼此联系的特定历史主题——它们有时但并不总是依据民族来界定,但他们的研究并不都是建立在研究对象之间的实际历史联系之上。研究全球

① “民族是一个情感的共同体,它将在其自己的国家中充分展现自我。因此,民族一般来说是一个倾向于建立自己国家的共同体。”参见 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Routledge, 1991, p. 176.

② Andreas Wimmer and Nina Glick Schiller,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Study of Migration: An Essay i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 (2003), pp. 576-610.

史的史学家探讨全球化的历史和全球化的史前史、成为全球化现象的事物的历史,以及像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这样次一级的地区之间的联系。将这些研究路径联系在一起的相似性是一种超越依据民族所界定的国家史和受到国家限制的民族史的意愿。这些研究计划共同构成了历史编撰中的国际转向。

这一国际转向或许代表着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史兴起和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转向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史学运动。^① 它因何而发生,同时又因何而涵盖如此广泛的历史编撰领域,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很好的问题。不过,它也向到目前为止极少涉及国际转向的思想史家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这种参与的缺失部分可以归因于构成国际转向的诸多历史研究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物质主义。研究资本、帝国和移民的历史学家,与具有全球抱负的社会学家和考古学家一道引领了对这一转向的讨论,并写出许多重要的综论性著作。对这些历史学家来说,思想史在这一术语的两个意思上都似乎是非物质性的:它是一种产生于人的头脑之中的历史;它是对来自内心世界的无形之物的非实在的想象。思想史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同这种怀疑论做斗争,而不屈从于化约论或消解他们研究领域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思想史本身的源头,回到史学作为民族国家侍女之前的时代。

思想史有理由称得上是尚未定型的国际史。正如唐纳德·凯利所指出的,观念史最初的实践者,从17世纪中期英国的托马斯·斯坦利(Thomas Stanley)到后拿破仑时期法国的维克多·库赞(Victor Cousin),都写下了在特点和内容上颇具世界性视野的著作。他们所写的历史从可以追溯至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哲学折中主义传统开始,但却最直接地产生于现代早期的认识论之争,即观念被认为独立于它们的起源,不论其起源是民族的抑或其他。^② 观念史的这些早期形式是“文人圈”(Republic of Letters)的独特产物,因为“文人圈”在其联系上、在其学术交流上都自觉超越了民族范畴。文人圈“包括整个世界,由一切民族、各个社会阶级、不同年龄和各种性别的人组成”,法国学者和文学家波拿文都拉·达尔贡(Bonaventure d'Argonne)在1699年写道:“它操着古代和现代的各种语言。”在一个从中国延伸至秘鲁的全球共同体内,“观念是不分肤色、没有年龄、无关种族、遑论性别的”——或许还应加上,它也是不关地方和无涉国家的。^③

思想史固有的对民族主义的抵制或许有一种让人感到矛盾的效果,它使得这一研究领域在近年来更难接受一种国际转向。由于思想史家无须拒绝各种民族范畴,也不必拥抱对他们来说是其他选择的世界主义,他们在方法论上或许并没有为这一转向做好准备。技术大发展在学术上的对应物,确实在最近让国际转向逼近思想史研究领域,就像这一领域从非民族转向超民族,从来就没有完全栖身于民族框架内一样。^④ 思想史赋予国际转向的或许跟国际转向赋予思想史的一样多。思想史家拥有一些最好的工具来探求诸如国际或全球性范畴的出现,探究观念的传播,应对国际转向提出的

① 对近年来历史写作中各种“转向”的更广泛的讨论,可参见 Judith Surkis, Gary Wilder, James W. Cook, Durba Ghosh, Julia Adeney Thomas, and Nathan Perl-Rosenthal, “AHR Forum: Historiographic ‘Turns’ in Crit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 (2012), pp. 698–813.

② Donald R. Kelley, *The Descent of Ideas: The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shgate, 2002, chaps. 1–2.

③ 波拿文都拉·达尔贡的话引自 Anthony Grafton, “A Sketch Map of a Lost Continent: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in Grafton, *Worlds Made by Words: Scholarship and Community in the Modern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9.

④ Margrit Pernau, “Whither Conceptual History? From National to Entangled Histories”,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7 (2012), pp. 1–11.

某些挑战——这其中有观念主义、古典主义和当下主义的危险,以及重新定义语境的挑战。这些便是思想史对国际转向做出的更为普遍的特殊贡献。尽管如此,这一转向的传统实践,尤其是对语境的空间维度的抗拒,必然使之要正视思想史的某些缺陷。

当前,空间是思想史研究的最后边界。国际转向通过关注大于民族的领域恢复了对空间概念的兴趣,这些领域不受国家政治疆界的限制,由跨民族的联系和传播结合在一起。有史以来的大多数时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帝国而非民族国家之中,为了搁置人口中的差异而不强求一种一致性,这些辽阔的、分层的政治体系都展现出各种各样的普世主义。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内,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一些帝国,尤其是欧洲和亚洲的帝国是充满自信的民族文化的自然产物,但多数帝国在构成上却是前民族的或超民族的。现代时期,海洋空间将这些帝国的诸要素联系起来,但是像地中海、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样的海域却也分裂成各种主权国家的属地,成为帝国间竞争的战场。^① 考虑到帝国存在的漫长历史,由国际关系的现代概念所假设的由国家组成的永恒世界似乎是短暂的,甚至是边缘化的。实际上,若依据某些判断,一个与帝国相分离的、由真正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仅仅出现在非殖民化的高峰时期,而且很快就被冷战结束之后突然出现的跨民族主义浪潮所涤荡。这样,国家的鼎盛时期仅仅持续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大约是从1975年到1989年。而在此之前和之后,所有的历史要么是前民族的,要么是后民族的。

通过同时进行的统一和分裂活动,帝国促进了观念的竞争,也助长了观念在各民族中和跨民族商业路线上的传播。从这种碰撞和传播中,出现了比如帝国、宗教、政治经济学的“竞争性的普世主义”,以及对抗或吸纳这些普世主义的扩张意识形态,比如泛伊斯兰主义、泛非洲主义、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带有肤色差别的世界主义”。只要是通过民族的视角来看历史,大多数这些运动都是无法洞察的。只有当古老的空间观念——它更加广阔、更具流动性,较少被限定在领土疆界之内——再次成为把握过去的框架时,它们才会被重新看到。

空间既可以作精确的理解,也可以作泛泛的理解。就这一点而言,研究科学的历史学家或许可以教给研究国际史的史学家和思想史家更多的东西。科学史中的“空间转向”怀疑真理的普遍性,强调知识的地方性:当每一种观点都来自某个地方时,就没有哪个地方可以产生观点。观念来自严格限定的空间,来自海滨和试验台,来自公共酒吧和皇家学院。当以微观方式视之,抽象知识构成的密不透风的网结果就成为由偶然关注之物拼成的易碎的拼图。如果这类著作的一个目的是揭穿科学理性所假定的普遍性,那么它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表明知识的碎片是如何积累和收集,它们的可靠性又是如何保证的。“我们不仅需要理解知识是如何在特定地点产生的,而且需要理解知识的交流在不同地点之间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观念是如何旅行的、谁输送了它们、它们在行程中携带了什么行李、它们在抵达时如何被驯化和吸收。^②

这种研究路径展现了信息收集错综复杂的机制,它让科学知识成为可能且言之有理。即便像牛顿这样生活在内陆地区的隔绝于世的思想家,他生平从未见过大海,却也能成为全球数学运算的中心所在,因为他拥有一个从东京湾到麦哲伦海峡的世界范围内的书信交流网络。^③ 在长距离知识传

① Lauren Benton, *Law and Colonial Cultures: Legal Regimes in World History, 1400–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Benton, *A Search for Sovereignty: Law and Geography in European Empires, 1400–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Steven Shapin, “Placing the View from Nowhere: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Location of Scienc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 s., 23 (1998), pp. 6–7.

③ Simon Schaffer, “Newton on the Beach: The Information Order of *Principia Mathematica*”, *History of Science*, 47 (2009), pp. 243–276.

播的意义上,耶稣会、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团体,促进了大科学的发展。^①后来的“帝国网络”消解了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区别,在以跨殖民地交流的方式积累的帝国档案、假说验证和意识形态生产中,每一个所谓的边缘都赢得了中心的位置。^②广泛而复杂的联系以这样的方式,借助观念和信
息跨越陆地和海洋的传播,将那些得到精心塑造的地方联系起来,去创造新的知识地图和跨民族
准则。

变化中的空间概念扩展了观念的背景,因此也扩展了思想的可能性。对欧洲思想史家来说,最熟悉的例子可能是为欧洲现代早期的思想家而形成的跨大洋探险和殖民的更广阔背景,因为跨文化遭遇和在印度洋、大西洋世界以及后来太平洋周边的帝国扩张,检验了自然、文明、政治共同体、财产、宗教多样性、宽容等概念。^③比如,约翰·洛克,这位旅行文学如饥似渴的读者,面对着从对五大
大陆记述中得来的各种多样性、信仰和实践的例子。^④托马斯·霍布斯,一位更加谦逊的美洲史料的使用者,通过参考人种志对自然状态的描写,形成了对国际关系的理解。^⑤大卫·休谟的政治经济学也大部分归功于他同大西洋世界的联系。^⑥当“伟大的人类地图”(借用埃德蒙·伯克引起共鸣的话语)铺展开来,思想真正实现全球化的可能性便为18世纪中期以后的几代思想家开启了大门——他们中有狄德罗、杜尔阁、亚当·斯密、康德、赫尔德、埃德蒙·伯克和边沁,结果是他们对普世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建构,以及他们有关文化和差异的观念。^⑦进入18世纪末,技术——最重要的是汽船、铁路和电报——对空间的压缩,使人们可以在帝国扩张和横跨世界之上去想象政治共同体的新形式。与上述福柯的说法一致,空间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思想产生的背景得以扩大,涵盖全球。现代思想史家因此不得不在未曾有过的广大视野下探究观念:大陆的、跨区域的、跨大洋的以及最终行星的。正如海德格尔、施密特和阿伦特在20世纪中期最早注意到的,太空或许是思想史真正的最后边界。^⑧

到目前为止,对思想史中国际转向的这种记述完全是积极乐观的,对成就的总结可以不断进行,但承诺并未兑现。国际转向在哪些方面可能是一次更糟糕的转向?这一转向尚未进入其应有的自我批评阶段,也没有吸引局外人更为持久的关注。不过,已经出现了一些对它的批评,其中就有具体化(reification)、当下主义、“古典主义”和变化的语境概念。这些批评并非专门针对国际思想史:他们都熟悉至少过去半世纪以来的有关观念史的争论。不过,由于在观念和之前未曾有过

① Steven J. Harris, “Long-Distance Corporations, Big Sciences, and the Geography of Knowledge”, *Configurations*, 6 (1998), pp. 269–304.

② Tony Ballantyne, *Orientalism and Race: Aryanism in the British Emp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 1–17.

③ Anthony Pagden, *The Fall of Natural Man: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Ethnology*, rev.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Annabel Brett, *Changes of State: Nature and the Limits of the City in Early Modern Natural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Daniel Carey, *Locke, Shaftesbury, and Hutcheson: Contesting Diversity in the Enlightenment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⑤ Srinivas Aravamudan, “Hobbes and America”, in *The Postcolonial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ed. by Daniel Carey and Lynn Fes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7–70; Pat Moloney, “Hobbes, Savagery, and International Anarch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 (2011), pp. 189–204.

⑥ Emma Rothschild, “The Atlantic Worlds of David Hume”, in *Soundings in Atlantic History: Latent Structures and Intellectual Currents, 1500–1830*, ed. by Bernard Bailyn and Patricia L. Denaul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05–448.

⑦ P. J. Marshall and Glyndwr Williams, *The Great Map of Mankind: British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Dent, 1982.

⑧ Michael Lang, “Mapping Globalization or Globalizing the Map: Heidegger and Planetary Discourse”, *Genre: Forms of Discourse and Culture*, 36 (2006), pp. 239–250.

的分析上的需要之间出现了新的分离形式,当思想史延伸至更大的空间领域时,这些批评变得更为尖锐。

具体化是一种为人们所熟悉的批评,至少可以回溯到剑桥学派对洛夫乔伊观念史的批评上:看上去是同一观念的重复,结果却是各种需要分析而不是被纳入跨越时间或空间的更广泛的叙述中的特定概念。比如,英国的自由主义与印度的自由主义并不相同:每一个概念都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发展,但它们并不是存在于彼此的无知里,而是出现在接受、传播和论点交锋等跨地方的对话中。^①至少在18世纪中期以后,接受的范围是跨区域和日益全球化的:像罗姆莫罕·罗易(Rammohan Roy)这样的19世纪的印度“自由派”,他们将自己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视为包括英国和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地、大西洋世界中的西班牙君主制,以及英国本身在内的世界范围的运动的组成部分。文本传递着观念,但总是在为超文本(paratexts)设定框架,为了自身的转化和再次应用,文本后来进入不可预知的语境中。这些条件从相似性中产生差异,但其程度很少是完全断裂和不可比的。如果考虑到这样的警告,堕入具体化的危险就可能消除。比方说有了来自接受史、书籍史和后殖民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帮助,就应当有可能避免陈旧的、缺乏深思熟虑的和超历史的观念史的危险,用一种更具方法论意义的观念中的跨时间的历史来取代它。^②

当下主义可能会带给国际转向一种更严重的危险。艾玛·罗斯柴尔德指出:“跨民族转向在一些明显的方面,受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公众对‘全球化’争论的影响。在这一意义上,(国际思想史)整个事业本身就是当下主义的。”^③然而,我们不能再继续表达当前的论点,就像我们不能否认过去出现过关于世界性、普世性或全球联系和概念的争论一样。这是一个自明之理——像所有自明之理一样,至少在定义上是部分正确的,即我们变化无穷的当下不断展示着过去的方方面面,它们曾经被忽视或未得到正确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与跨民族史其他方面的情况一样,有两种可能的方法:“第一种方法表明,联系确实存在,亦为过去的行动者所知,但却出于某种原因被遗忘或搁置一旁。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再次发现这些失去的线索。与之相反,第二种观点假设,历史学家可以像电工技师那样行动,借助想象性的重建而不是简单的复原来连接电路。”^④第一种方法——联系而不是比较,重建而不是复原——可能更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所采用,但是第二种方法,对于在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当前所关注的事件之间拉开必要的历史距离,一定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想象我们不能透过一块黑色的玻璃看见我们当前所关注的那些事件,我们无疑是在欺骗自己。我们只有将之置于广阔的视野中,才能更清楚地看见它们。

“古典主义”——即“一般来说,只有地位显赫的人、大人物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是个体精神或个体本身历史的主体”这一观念——对思想史提出了类似的批评。^⑤约翰·穆勒早在1838年为边沁和柯勒律治辩护时,就驳斥说:

① C. 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Indian Thought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 and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David Armitage, “What’s the Big Idea?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Longue Duré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8 (2012), pp. 493 – 507; Armitage, *Civil War: A History in Ideas*, Knopf, forthcoming.

③ Emma Rothschild, “Arcs of Ideas: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Gunilla Budde, et al., *Transnationale Geschichte: Themen, Tendenzen und Theori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6, p. 221.

④ 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The Age of Revolutions, c. 1760 – 1840: Global Causation, Connection, and Compariso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c. 1760 – 1840*, ed., Armitage and Subrahmany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xxxi.

⑤ Rothschild, “Arcs of Ideas”, p. 222.

思辨哲学,表面上是一种远离人类生活事务和外在利益的东西,实际上却是世界上对人类影响至深的事物,并最终压倒了除它本身必须遵从的影响之外的其他一切影响。我们谈及的这些作家,大众从未阅读过他们的作品;除了他们著作中极少的一部分外,他们几乎没有读者:但是他们却是万事之师。^①

在思辨哲学家和大众之间,是罗斯柴尔德称之为“中间人”或“传递思想”的思想家,他们的见解过于平常,而不能成为个体思想传记的研究对象;但他们的见解也过于远离他们的思想轨迹,不能被纳入任何心态史研究中。这对那些影响各种各样公共政策制定的人(并非只有他们)尤其如此。^②这些人通常是环球旅行者、中介人、亚非欧三大洲大量移民中的一员,他们跨越(并一再跨越)大西洋、太平洋和大草原,但他们同时也是跨文化的代理人,贩卖地方性知识,传送“全球情报”。^③在历史学家重建他们思想活动的形式、重建他们观念的历史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期待发现甚至更为普遍的跨民族思想方式的证据。^④

跨民族史研究需要对语境做出越发灵活的界定,这不应让思想史家感到沮丧。一些学者开始询问,如果语境现在被定义为包括跨大陆交流的、多语言的共同体,或不断扩张的世界体系的话,那么怎样才能正确理解“语境中”的观念?^⑤这里机会或许再次大于风险。与之相关的准则必须被界定,积极的(或至少是合理的)传播路线要加以绘制,参照的尺度也应该依据当代人的国际或全球概念进行校正。对那些我们所探索的跨越边界的和跨越受到限制的话语共同体的观念来说,有了这样的地方中的边界,重建有意义的空间语境才可能是行得通的。

正如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史研究来说,将时间概念历史化是一项重大工程一样,将空间概念历史化——不论这种空间概念是民族的、国际的、跨民族的还是全球的,实际上有可能隐含着国际转向之后的思想史议程。这个议程不可避免地导致下述问题,即全球转向对思想史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尽管已经开始对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但全球思想史将由哪些内容构成,甚至它的主题将会是什么,依然远非那么清晰。^⑥全球转向是否只是国际转向在逻辑上的延伸,或者是一种仅凭一己之力的不同寻常的努力,我们仍需拭目以待。有着这种宽广的视域和诱人的前景,迎接思想史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国际和全球转向,就一定不会是草率的,因为这些转向终究还是为了历史的编撰。

(张旭鹏译)

① J. S. Mill, "Bentham", *London and Westminster Review*, 19 (August 1838), p. 467.

② Emma Rothschild, "Language and Empire, c. 1800", *Historical Research*, 78 (2005), p. 210; Rothschild, "Political Economy", in Stedman Jones and Claeys, *Cambridge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774 - 776.

③ Simon Schaffer, Lissa Roberts, Kapil Raj, and James Delbourgo, eds., *The Brokered World: Go-Betweens and Global Intelligence, 1780 - 1820*,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2009.

④ Sugata Bose and Kris Manjappa, *Cosmopolitan Thought Zones: South Asia and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Ideas*,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Emma Rothschild, *The Inner Life of Empires: A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⑤ Goto-Jones, "The Kyoto School, the Cambridge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Wartime Japa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7(2000), p. 14.

⑥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